



# 讀書周刊

## 中国学者笔下的德国通史

德国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之一,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还是在科技教育、艺术文学和思想文化领域,都对欧洲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鉴于德国在世界上的这种重要影响力和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我国史学界对之表现出浓厚兴趣,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德国通史》由知名德国史专家邢来顺、吴友法主编,多位国内著名德国史专家历时十年撰写而成,是国内首部多卷本大型德国通史。全书共六卷,以欧洲文明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为背景,叙述从史前到 21 世纪初(2010 年)的德国历史,是中国的德国史研究标志性、总结性成果。下文为各卷作者所撰每卷内容的扼要介绍。

### 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开始在动乱中迈入近代社会

王亚平

德国地处欧洲的中部,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使其从古代时起就在欧洲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德国通史》第一卷《封建帝国时代》从远古时期气候的变化、外来移民的迁入开始,阐述了至 1500 年德意志的历史变迁。

5 世纪中叶,法兰克人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法兰克王国,法兰克人把罗马帝国晚期的大地产制与马尔克的社会机制(马尔克社会机制指的是古代日耳曼人按地域关系由若干大小不等的村落组成的土地公有私用的农村公社,是从氏族公社向土地私有制过渡的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融合在一起,接受了基督教教会提出的“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观念,通过采邑制改革形成了政教二元的封建政治体制,在逐步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建立起了一个囊括西欧和中欧的法兰克帝国。

9 世纪的法兰克帝国因王位继承问题经历了多次分分合合,最终解体为东西两个法兰克王国。10 世纪初,东法兰克王国的五大公爵们为共同抵御匈牙利人的人侵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选举国王,由此完成了从东法兰克王国向德意志王国的转变,也因此确立了贯穿整个中世纪的选王制度。

奥托统治时期通过“奥托特恩权”在德意志国内培植了势力强大的教会贵族,并与罗马教会合作争得了罗马皇帝的皇冠,德意志的国王有了双重身份,即:德意志的国王和罗马人的皇帝,在西欧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貌似庞大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

德意志早期确立的选王制、保留下来的马尔克社会机制以及“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构成了德国中世纪历史的三个特征。教会和修道院与世俗贵族是德意志王(皇)权的两大政治支柱,广大的自由农民和非自由农民被组织在庄园和马尔克中,从事农业的和手工业的经济活动,社会被划分为三个等级。

11 世纪中叶,在德意志皇帝的支持下进行的教会改革膨胀了罗马教皇的权力欲,因争夺对主教的授职权双方起了冲突。主教授职权之争改变了德意志皇权和教权的关系,罗马教皇与德意志的贵族联合起来另选新王(皇)迫使其就范,自此改变了德意志原有的政治格局,导致分裂割据愈演愈烈,乃至出现了“大空位”时代,并最终确立了选帝侯制度,德意志帝国走上了邦国分治的道路。

11 世纪开始的农业拓荒运动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有了以市场为核心的城市经济体,大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地区的经济中心。从事海外贸易的城市结成汉萨同盟,在国际贸易中举足轻重。农产品进入商品流通轨道不仅改变了土地原有的经营方式,也改变了原有社会阶层的构成。处于分化状态的农民揭竿而起,农民战争如火如荼。以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新兴市民是注入第三等级中的新的社会因素,他们在新兴的大学城接受罗马法的教育,在他们中间涌现出来的人文主义者们,勇敢地向着罗马教会的宗教权威发起了挑战,由此拉开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德意志在动乱中迈过了进入近代社会的门槛。

### 在并非完美的意义上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创建

孙立新

《德国通史》第二卷主要记述了 1500 年—1648 年的德国历史。这是一个“信仰分裂时代”,也是德国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时期。而其最重要的事件则为“神圣罗马帝国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本质上是一个宗教事件,它最深的关切是神学性的。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宗教改革发起者马丁·路德长久以来就对负有“原罪”之人的“得救”问题苦思冥想,希望得到一个确切答案。他也曾尝试教会所提供的“救赎”方法,希望通过刻苦修练获得上帝的宽恕,但这一切都徒劳无功,在极度绝望时,路德顿悟到上帝的恩典,从而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并且为了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即使被教皇开除教籍,被皇帝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者,他也不放弃自己的学说。而在帝国选侯、萨克森公爵弗里德里希三世的保护下,不仅路德的身家性命得到了保全,“路德事件”(Causa Lutheri)也从纯宗教领域转入了宗教政治斗争领域。

路德揭露罗马教皇的腐败堕落及其对德意志民族的剥削掠夺,呼吁德意志贵族在组织上、司法和行政管理上摆脱罗马教廷的一切控制。他的一系列宗教—政治主张不仅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也受到不少诸侯的大力支持。在“激进派宗教改革”和“普通人革命”高潮过后,“诸侯宗教改革”也广泛开展起来。



资料图片

《德国通史》(六卷本)  
邢来顺 吴友法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一大批皈依了福音教的诸侯自觉承担起邦国宗教领袖职责,进一步将教会事务纳入政府管辖范围。他们选派神学家和法学家进行教会视察,纠正弊端,纯洁教士队伍;颁布法令,规定教牧制度、教会教义和礼拜仪式,创立宗教统一;设立由法学家和神学家组成的“教会监事会”,处理基督教婚姻和家庭纠纷事务;建立基督教学校,实行强迫教育;加强政治驯化、社会监控以及对行为反常的团体的镇压或者驱逐,打造新型的社会秩序。

诸侯宗教改革制止了罗马教廷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和剥削,废除了教会凌驾于国家和民众之上的特权,排除了皇帝或帝国机构向邦国施加压力的可能性,确立了由诸侯和邦国政府决定邦国的宗教信仰、管理和处理宗教事务的制度,促进了邦国的国家化建设。一些管辖区较大、实力较强的邦国,如奥地利、巴伐利亚、萨克森、勃兰登堡、汉诺威、符滕姆贝格和梅克伦堡等,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各种各样国家机器和国家主权的独立国家,其统治者也成为精神上 and 尘世上的双重领袖,为实行邦国君主专制奠定了基础。

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多民族混杂局面不同,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各个邦国大都是德意志民族的,尽管仅仅由德意志民族中的部分群体所构成。在这些邦国经过宗教改革发展成为拥有国家主权的“独立王国”之后,统一的德意志现代民族国家已经不可能由神圣罗马帝国来创建了,唯一的可能性是由某个或某些德意志邦国来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即使这条道路是十分曲折和漫长的。直到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鲁士国家才借助拿破仑战争和解放战争之风,通过首相奥托·冯·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以排除奥地利的方式,建立起了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多个德意志邦国联合的“小德意志民族国家”,在并非完美的意义上完成了德意志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进程。

### 以普鲁士王国为首进入欧洲大国行列

刘新利

从 17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初期,德国历史经历了君主专制、启蒙运动、解放战争以及现代化改革等重要的历史事件,由此摆脱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重负,以普鲁士王国为首进入了欧洲大国的行列。

17 世纪中叶,使德国遭受严重创伤的三十年战争结束(1648 年)以后,德意志各邦君主采取中央集权的专制措施,励精图治,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不仅普遍地恢复了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而且还有几位突出者,如巴伐利亚公爵、维尔茨堡主教及萨克森选帝侯等等,开始大兴土木,效仿法国的凡尔赛宫,建造和装饰宫殿官邸,在德国土地上留下了影响至今的所谓“声望政治”工程。

历史进入 18 世纪,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德意志专制邦君将某些启蒙理想落实于政治实

践,推崇国家至上原则,采取包括增设专业的经济管理部门、鼓励发展工商业、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建立世俗的教育机构等措施,实行所谓的开明专制。作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不经过人民”的政治体制,开明专制同时启用君主集权的专制机构和专业官吏的管理部门,其统治战略,不仅为了富国强兵而将经济发展放在万事之先,而且为了争取或巩固国际地位而将稳定本邦的社会秩序当作内政之首要。到 18 世纪中叶,德意志的南北两个大邦——奥地利和普鲁士——已经具备跻身欧洲强国的实力。18 世纪后半段,为了维持和发展其强国地位,奥地利和普鲁士在欧洲争霸的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扩大殖民区域。然而,当法国大革命、革命战争直接决定欧洲历史进程的时候,奥地利失去了已经顶戴数百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冠(1806 年),急速缩小了世袭领地和势力范围;而普鲁士,这个一度以“军事强国”著称的邦联形式取代了古老的帝国体制,但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与神圣罗马帝国体制下的邦领,几乎没有性质上的差异,它们都是主权联邦邦国;并且,虽然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推行了现代化改革,但仍然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各类贵族的政治特权,而市民和农民这一社会的基本劳动者阶层,则在统治者不断变换的过程中陷入新的生存危机。这一切将汇成德国革命乃至德国统一的历史背景。

### 通过“双重革命”完成工业化进程

邢来顺

从 1815 年到 1918 年的一个多世纪,属于德国以独特方式全面迈入“现代”社会的近代晚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顶峰阶段。在这一时期,它通过经济和政治方面与英、法等西方国家不同的“双重革命”,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迈上了强国之路。

这一时期的德国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稳中求进的“守势现代化”道路。传统统治阶级采取适

时而进的策略,通过满足某些“革命”要求,操控德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进而保障自身传统利益。以俾斯麦为代表的普鲁士统治者完成德意志民族统一大业,建立起德意志帝国,是典型的顺应历史潮流的“白色革命”。

在建立现代国家体制方面,传统统治阶级也展示了适时而进、操控时局的特征。1848 年的普鲁士“钦定宪法”和 1871 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在,在确保君主制原则的基础上,注入选举制、议会制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元素,建立起君主立宪制,既保证了传统统治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又满足了资产阶级的愿望。

这一时期的德国经济发展也具有明显的特点。从 19 世纪 30 年代到 20 世纪初的约 80 年间,德国通过两次工业革命中的独特工业化发展模式和产业发展战略,快速实现了对英、法等老牌工业国家的超越,最终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工业化强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作为后发国家的德国没有模仿英、法等国的轻工业发展模式,而是采取通过铁路建设直接推动钢铁、煤炭、机械制造等发展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取得极大成功,工业实力在 19 世纪 60 年代超过法国。此后它又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机遇,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煤钢产业,同时积极拓展新兴电气和化学工业领域,发展成为世界工业先行国家。到 20 世纪初,德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跃居欧洲第一位。

这一时期德国社会领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转型。城市化进程加速,到 20 世纪初,城镇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成为国家的主体居民。社会阶级结构也出现新变化,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通过前者的资产阶级化和后者的贵族化而两相接近。工人阶级则发展成为最大的社会群体。工业化也推动着德国向现代福利国家迈进。德国勇开先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度。

这一时期的德国科技、教育、思想和文化发展也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繁荣局面。为满足工业化需求,科学技术研究凸显出实用化和前沿化的趋势,教育则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进行了新的调整 and 改革;思想和文化界也努力进行调适,寻找新的表达形式,反映新的社会现实,呈现一种多元发展趋势,呈现繁荣局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迅速崛起中的强大国家,却在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噪声中,不智地将自己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之中。

### 仅仅 27 年所发生的事却是德国史中最丰富的

郑寅达

第五卷所覆盖的时段,是 1918 年至 1945 年,仅 27 年,在全书六卷中是最短的。但是这 27 年中所发生的事情,却是整个德国历史中最丰富

的,跌宕起伏,上天入地,以至于原先的设计,是用两卷的篇幅去叙述它,而且得益于我国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基础较好,两本书都已经基本成形。后从全书的体系合理性考虑,忍痛把两卷合并成一卷。

人们经常用“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来形容前 15 年的魏玛共和国。如果共和思想仅存在于理念上,没有在国家架构上充分体现,则后 12 年的纳粹统治,不过是把共和的面纱轻轻地拨到一边而已,轻松得很。如果情况真是这样,27 年的德国历史,是很容易叙述的。

真相并非如此。这 27 年中,德国尽管国名继续沿用 1871 年采用的 Das Deutsche Reich(这时可译成“德意志国家”),实质上却是两度建国,分别创建了两个在人类历史上都留下鲜明特色的国家。

本卷直面魏玛共和国的全过程,从共和国的由来和构建入手,深入探索在搭建共和国框架的过程中,各种意见的交锋和各种力量的博弈。房屋架构与地基之间的错位,造成先进的共和制度的生存之难,在 1924 年之前,新生的魏玛政权搏击于国外的“凡尔赛体系”,国内的左右翼力量之间,总算站稳了脚跟。1924—1928 年,是魏玛共和国的黄金时期。然而随着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到来,共和国又转入厄运,并且逐渐沉沦,直至最后覆亡。魏玛共和国覆亡和纳粹德国产生,是一块硬币的两个侧面,所以本卷用了一节篇幅,专门探索共和国覆灭的原因,从帝国的负面遗产、国际格局的影响、魏玛民主制度的缺陷、共和国的国内状况等视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国读者对纳粹德国并不陌生。得益于世界级畅销书《第三帝国兴亡》被中译,纳粹德国的某些细节已经被国人知晓了数十年。遗憾的是,作者威廉·夏伊勒是新闻记者而不是史学家,对国际史学界的学术动向缺乏敏感性。当以 A·J·P·泰勒为代表的二战起源“修正学派”兴起,同时向法西斯问题研究蔓延时,他却毫无感应,在书中继续以陈旧的“正统学派”观点加以处理,其通俗读物的架构和漂亮的文笔只会加剧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我国学术界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去叙述这段历史,就会脱离国际学术前沿。实际上,希特勒对魏玛共和国动了大手术。他在不修改国名、不废除魏玛宪法的外表下,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都大动干戈,形成了一套纳粹式的体制机制。其力度之大,无异于建立了一个新国家。在企业运行问题上,纳粹当局力图组建“企业共同体”;在农业领域,大搞“农民崇拜”;纳粹主义是一个整体,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纳粹分子在改造国家的同时,把侵略魔爪伸向世界,最终使德国陷入了灭顶的深渊。

### 深刻反思二战灾难 勇敢承担历史责任

吴友法

二战后的德国历史基本上是健康、平稳发展的,虽然也有波折,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大起大落。这得益于战后德国建立了适合自己国情的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建立是盟国对德国的改造和德国人民对过去历史反思的结果。

在缺乏民主基础的德国,外来力量的冲击是民主政治得以确立、缓慢演进,并最终完全建立的重要推手。在德国历史上,拿破仑入侵的铁路催生了德意志的民族民主主义,从而使德意志民族真正觉醒和民主意识启蒙。在一战行将结束之际,为避免陷入全面崩溃,德国请求美国出面“媾和”,其条件是德国必须结束“君主专制”统治,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德国被迫进行宪政改革,实行民主化。在魏玛德国民主建立过程中,威尔逊和美国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共和国的“助产士”。二战后,德国又一次在盟国帮助下,通过处置德国、对德国实行非纳粹化、非军国主义化、非工业化、民主化的“四化”改造运动,在东西部德国分别建立了东、西方类型的民主制(1990 年两个德国合并为联邦德国)。在西部德国,建立了类似西方模式的、并适合自己国情的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即政治上,鉴于魏玛共和国实行不稳定的多政党议会制度失败的教训,以及吸收西方民主的经验,联邦德国实行了新型的政党结构,建立了稳定的联邦政治体制。经济上,吸取市场和计划经济两种模式的利弊,制订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联邦德国政治经济模式被称为莱茵模式,或曰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德国曾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和世界,也给德国人民造成了重大灾难。二战结束后,在同盟国的“四化”改造的同时,德国人民对二战造成的灾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勇敢地承担起历史战争的责任。比较稳定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德国上层有识之士对历史的经常性反思,在战后德国发展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德国在战后成为欧洲及世界强国之一的重要原因。